

# 北方的雪

刘醒龙

在雪的世界里，哪怕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准备，每当白雪扑面而来，仍然免不了有种不期而遇的感怀。

到盘锦的路上，刚过郑州，车窗外就飘起了雪花，再往前走了不一会儿，地上就花白了。车过安阳，地上已是白茫茫一片。如此一路向北再向北，漫天的雪花也跟着一路向北再向北。过了山海关，偶尔抬头一看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点，车窗外的白雪竟然不见了，满眼全是中国冬季里颇显沧桑的黑土地。

车到盘锦，因故与接站的朋友错过，便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独自赶往将要下榻的酒店。说话间，发现驾驶座上裹得严严的是一位女司机。因为心里惦记着一路追随却被自己丢在山海关的那场白雪，刚刚坐定就开口问，盘锦这里会下雪吗？女司机正用对讲机与另一位女司机聊着她们常去的一家餐馆，随口回应一句，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雪，接着又与那位听得见却看不见的女伴继续聊她们口中好吃的蟹。这时候，我还不知道，盘锦这里是北方螃蟹的集散地，更是将作为美食的螃蟹在灶台上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反而以为在天寒地冻的东北，拿螃蟹来说事是不是太闲了。浑然不知，别处有“村BA”“村晚”“村光大道”和“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”等，此地更有别具一格的“蟹王蟹后争霸赛”，那个头大到超过六百克的大螃蟹，居然是在如此冰天雪地盘锦土地上繁衍出来的。

平淡无奇的出租车行驶了二十分钟，两位女司机的闲聊都有点让人昏昏欲睡。不知是关外的天气黑得早，还是像南方那边，有雪的天气会使得天空显得更黑。如果真的换成南方，只要有预报说大雪将至，任何一座城市都会莫名地躁动起来。比如十几天前的武汉，家门口的中北路上空稀稀拉拉地飘洒一阵雪花，落到地上连雨点都不像，便引得半城的人们热议纷纷。

到盘锦的第一个夜晚，同样平淡无奇。一场好睡之后，打开窗帘，赫然发现，晨光的盘锦被一层厚厚的白雪完全包裹起来了，如果不是那些凭空矗立的高楼，表明这里是一座小城，肯定会以为自己置身于诗画般的林海雪原。在南方，像这般美妙的雪景，已经是少年前的记忆了。所以，偶尔来一场雪便引得人们大惊小怪，以为得了上天的恩宠，免不了会将一丁点的小雪，当成天大的事情，忍不住用上一些夸张的词汇与言语。当然，雪的白，是人世间最美的洁白，多用好言好语进行赞美，也不会引起众怒。

接下来与盘锦当地朋友说话，以南方标准称之为“这场大雪”时，朋友轻飘飘地纠正说，这是一场小雪。有家在更北的吉林的朋友说，在他们那里，人们会说，啊，夜里下了一场轻雪。

掩映在雪中的洁白盘锦小城，在自己人的说法中，显出一种娇羞，有一种娇嫩，有一种娇柔。这在别处是感受不到的。去年差不多这个时间，在哈尔滨赶上一场大雪的尾巴，除了能够联想这是萧红笔下的雪，剩下的全是雪啊雪这种模样才是雪的念头。

在随后与盘锦多个侧面的接触中，这种感觉尤为明显。来盘锦才认识的一位朋友，坦率地表示，许多盘锦人并不知道自己日常起居的地方是一座海滨城市。朋友身材壮实，为人豪爽，说起这话时，略小的眼睛里，那几丝对不起家乡的羞怯分外明显。这样的情感很容易理解，就像我居住过的小城黄州，如果不知道它挨着长江，那是多么不好意思啊！就像我居住过的小城英山，如果不清楚它坐落在大别山中，将会怎样尴尬呀！说话间，朋友一转话锋，进一步说，其中原因是盘锦人大多看不清海岸线，只看得见漫无边际的滩涂，只看得见漫无边际的滩涂在十年后长出红艳艳的碱蓬草，只看得见长满红色碱蓬草的滩涂上十年后长出青翠的芦苇，只看得见长满青翠芦苇的滩涂十年后变成连绵不绝的稻田，再在这一般人不敢想象的优质稻田里，种出一公斤可以卖到一百六十元的优质大米。二〇一九年九月，我曾慕名来盘锦看过这样的红海滩和这般金黄的稻田，那是一种伴随收获与富足的沁人心脾之美。这一刻，雪的洁白，抒情地朝向可能是海边水线的地方铺展，旷野上除了雪，还是雪，好在我们已知道，在雪的下面，深深地植人了美的基因，让美在日复一日地壮大舒展。就像朋友所表现出来的娇羞，背后是足够强大的底气。

雪以洁白身姿对大地覆盖，在半寸山丘也没有的盘锦，每一朵雪花都可以体现自身的价值，其洁白无瑕不会被突兀的高地所遮挡，其细小的身躯又会因为一马平川的视野而无法忽略其小小的高度。一条辽河，一条大辽河，还有一条一条又一条，据说是九条，又据说是二十几条河流，穿过从原烂泥淤积的滩涂，后来红遍北国的红海滩，再后来稻花飘香的田野，以及如今的富裕安详的城市，奔向站在盘锦土地边缘肉眼无法看见的大海。

白雪带给盘锦的娇柔同样是有意蕴的。那一天一行人站在辽河一处叫庄台的断壁残垣中，听大连来的女作家素素讲甲午战争的最后一战，并将甲午战争分成甲午海战和甲午陆战，且痛惜前者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，后者却知之甚少。素素用沉稳的女中音将发生在清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三月八日，脚下盘锦这里，集合了两万多名清军士兵与两万多名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人血战，才几小时便告结束。两千多名将士的牺牲，仍旧没能改写甲午之战清军无一胜绩的历史。从庄台行至已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清军坟，面对那块曾经刻有“英雄古墓”的石碑，反复默诵着“光绪乙未，帅自南来，抖抖旗舞，血战世界，英名万古，以为志哀”的碑文，久久不肯离去。痛定思痛心更痛，深谙这段历史的素素也不说话了。雪地里的晚风格外刺骨，此时此刻，也只有这样才能回应这刻在中国人心头的耻辱之痛。

在白雪皑皑盘锦土地上行走，小城的娇美一直是大家的主要话题。突如其来的是沉重令大家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或许是察觉到朋友们的心情，同行的尹汉胤说起毛泽东的诗词《沁园春·雪》。尹汉胤是画家尹瘦石的长子。当年，毛泽东冒着极大风险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。抵达重庆后，毛泽东与柳亚子会面，尹瘦石不仅在场，还为毛泽东画了一幅他生平唯一一次坐着当“模特儿”的画像。会面结束后，毛泽东将《沁园春·雪》亲手抄录赠予柳亚子。柳亚子看后，不禁大声惊呼此为千古杰作。作为柳亚子好友的尹瘦石，深受触动，随后决定前往延安，柳亚子便将这首诗的手书相赠，以作勉励。望着盘锦这里极美的雪景，几个人齐声朗诵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”随着心情的反转，也随着话题的振奋，眼前盘锦这里的点点滴滴，无不在回应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。

如约而至的白雪，将北沙岗、三道梁等石器时代遗址覆盖了五千年，也将北塔子和东沙塔子等商周时期遗址覆盖了三千年，黑陶、红陶和青铜在这片完全由辽河冲积而成的平川上，随着新的冲积仍在年复一年地继续，所生成的新的陆地引发人们的关注，让这方水土显得那么年轻。那位酷爱民间传说，更酷爱这方热土的七旬长者，依着爷爷的爷爷的教诲，将那块明代石碑热爱成唐碑。传说总是如此幼稚，又如此迷人。那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小楼内，那位帅气的中年男子主导研究的水飞蓟产品，悄然走红于世界各地，多少年后，会不会被传说成为盘锦这里能生产某种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呢？

再美的雪，也有融化的时候。柳亚子感叹的千古杰作，也可以用来说一说盘锦，比如那句：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
12 **长江日报**

2026年1月7日 星期三  
主编：周璐 美编：职文胜  
版式：洪菊华 责校：江婧

从发现到确证的文化抗战稀世实录

万忆



# 烽火弦歌

——华中大学内迁影像首度公开

万忆 谢诗思

近日，一段尘封 85 年的珍贵影像资料引发学界关注。这部 1941 年由美国摄影师约翰·鲁纳尔斯（John Runnels）用 16 毫米胶片拍摄的短片，以鲜活形象再现了抗战时期华中大学（今华中师范大学）西迁云南大理喜洲的办学场景。这段历经修复上色的影像，不仅是中高等教育在抗战烽火中赓续文脉的见证，更揭开了西南边陲古镇与流亡大学相互滋养的传奇篇章。

## 从武昌到苍洱： 千里跋涉中的文教火种

1937 年 7 月，卢沟桥的枪声将华北推向战火，未及一年，长江沿线亦狼烟四起。在民族教育面临巨大危机的紧要关头，为保存教育火种、延续民族教育血脉，东部、中部的高校纷纷响应号召，开启西迁之路。1938 年武汉沦陷前夕，华中大学作为华中地区最早内迁的高等学府之一，在校长韦卓民带领下开启三迁征程。师生们经桂林、过越南，最终于 1939 年 3 月抵达云南大理喜洲——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古镇，竟因此与中国的现代教育史产生了深刻交集。

影像开篇即是喜洲标志性建筑“题名坊”，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功名碑林，铭刻着数百年来 138 位科举及第者的姓名。镜头缓缓推进，可见坊前市集上，穿着阴丹士林布长衫的华中大学生与身着白族服饰的乡民错身而行，土陶罐里的乳扇与油纸包裹的洋装书籍共置一摊。当现代大学遇上传统耕读社会，两种文明形态在战火中达成了奇妙共振。自此，古代功名碑林与现代大学、茶马古道与流亡课桌，在苍山脚下达成沉默而坚定的契约：书声不歇，则古塔不倒；耕读传家，亦兼济天下。

## 寺庙里的实验室： 战时教育的“螺蛳壳道场”

胶片中最令人震撼的画面，当数大慈寺文庙内的办学场景。大慈寺本是喜洲乡绅祭孔之所，飞檐斗拱下常年香烟缭绕，钟声里有“礼乐传家”的余韵。镜头穿过悬挂“文明”匾额的魁阁，显露出被改造为图书馆的“奇观堂”——昔日供奉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殿堂，此刻堆满贴着“武昌转运”标签的木箱，穿着补丁长衫的学生正就着天井光线研读外文原版书籍。

文庙两侧空地矗立着三座简易板房，标注着“生物系”“化学系”“物理系”的木牌在风中摇曳。其中化学实验室场景尤为珍贵：学生们使用竹制量筒、土陶蒸发皿进行滴定实验，墙上手写标语“一滴试剂一寸金”道尽物资匮乏的艰辛。理学院院长徐作和教授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们从昆明采购的烧杯，要用马帮驮运半个月，十件器具运到往往只剩三件完好。”八年里，这座“螺蛳壳道场”送出两届毕业生——有人在竹棚里做出云南第一份土壤酸度报告，也有人把自制显微镜背上海线，教会军医辨认疟疾原虫。孔庙的飞檐依旧指向星空，而星空下，新的文明火种已悄悄生根。

著名作家老舍先生 1941 年造访喜洲时，正是在这片“螺蛳壳道场”中重逢故友。他在《滇行短记》中写道：“华中大学却在文庙和一所祠堂里。房屋又不够用，有的课室只像卖香烟的小棚子。”然而他笔锋一转，又充满敬意地记下：“足以傲人的，是学校有电灯。”这盏灯，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光源，更是精神层面的象征——在至暗时刻，知识之光从未熄灭。

## 木炭发电机与稻田操场： 逆境中的技术突围

影像中一座由卡车部件改造的木炭发电机引发关注。这台由物理学家熊子璇设计的设备，巧妙利用当地盛产的核桃壳作燃料，不仅让实验室获得稳定电源，更使文庙檐角亮起了西南地区最早的校园电灯。老舍在《滇行短记》中对此惊叹不已：“校车停驶，即利用车中的马达磨电。据说，当电灯初放光明的时节，乡人们不远千里而来‘观光’。”他继而感慨：“用不着细说，学校中一切的设备，都可以拿这样的电灯作象征——设尽方法，克服困难。”

熊子璇后来把全部图纸寄往昆明中央机器厂，滇西十余所中学因此受益。他本人 1946 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，却始终保留着那只核桃壳气化炉的铜质喷嘴。

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改造自寺庙香火田的体育场：没有跑道划线就用石灰粉替代，足球门框是毛竹捆扎而成，上课铃竟是借用大慈寺的百年铜钟。教育学家黄溥教授的日记记载：“钟声响起时，常有白族老妇合十祈愿，她们说佛堂钟声伴着读书声，是给战乱中最安稳的力量。”下午 4 点，钟声一荡，乡民与师生一起涌进稻田：有的赤脚追球，有的绕场跑圈……多年后，黄溥把这块“稻田操场”写进《战时中国大学体育考》，题目只有一句——“钟声里的 400 米”。

## 学者群像： 乱世中的文化守夜人

胶片罕见捕捉到多位学界巨擘的身影——

中国文学系主任包鹭宾教授立于文庙丹墀讲授《楚辞》的镜头，成为这位楚文化研究先驱现存唯一的动态影像。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位在镜头中神采奕奕的学者，四年后因疟疾殉职于喜洲，临终前仍在批注《诗经》讲义。

教育学泰斗黄溥教授的片段更具历史价值：画面中他正用英文为学生讲解杜威教育理论，身后黑板上却写着“礼义廉耻”四个大字。这种“中西合璧”的教学场景，恰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坚守的缩影。

前文提到的徐作和教授，在喜洲的桐油灯下完成《洱海周边土壤酸度调查》，这项成果在当时的学术与教育领域意义重大，被誉为“战时西南文化教育四大支柱”之一。1939 年，徐作和病逝，按其遗嘱，部分骨灰撒入洱海，碑刻一句：“竹筒量岁月，土瓷煮乾坤。”

另据档案记载，当时华中大学仅有 15 人的喜洲教师团队中，拥有博士学位的竟达 9 人之多。

老舍在《滇行短记》中深情回忆：“四年前，我离家南下，到武汉便住在华中大学。隔别三载，朋友们却在喜洲相见，是多么快活的事呀！住了四天，天天有人请吃鱼：洱海的鱼拿到市上还欢跳着。‘留神破产呀！’客人发出警告。可是主人们说：‘谁想到你会来呢？’破产也要痛快一下呀！”字里行间，既有乱世重逢的悲欣交集，更有知识分子在困厄中仍不失温情与幽默的风骨。

谨以此文，致敬烽火中守护文明火种的师生，也铭记这场跨越八十余载、从发现到确证的学术追寻——因为看见，所以铭记；因为真实，所以不朽。



1932年被聘为华中大学的终身教授



化学和物理三系实验室



悬挂“文明”匾额的魁阁被改造为图书馆的“奇观堂”。

## 喜洲记忆： 古镇与大学的共生传奇

影像后半段揭开了战时大学生活的另一面：散布在古镇各处的学生宿舍。男生租住在严家大院，女生栖身于董家祠堂，每日穿过稻田石板路往返课堂。古镇的灰瓦屋檐与大学生的蓝布长衫，就这样在一条不足三里的田间小路上相映呈现。

最具特色的是“伙食自治”制度——“伙食自治”是韦卓民校长定下的规矩：学校按人头月拨九块半银圆，每个宿舍自选“膳食委员”，每月从学校支取固定的伙食经费。镜头中女生们围坐拣菜的场景，与白族阿妈晾晒的梅干菜构成和谐画面。

这种深度融入社区的办学模式，催生了特殊的文化交融。大理学者杨宪典当时还是少年，据他回忆：“华中大学生在四方街办识字班，白族木匠帮学校打造实验室，连寺院方丈都允许把《金刚经》暂移偏殿，腾出藏经阁放置显微镜。”多年后，杨宪典在《喜洲往事》里充满深情和诗意地写道：“大学像一条河，流进古镇的巷口，把书声、菜香、木鱼声都冲在一起，谁也分不开谁。”

老舍来访期间所住的“阔人们的祠堂”，正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生动体现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教师们都分住在镇内，生活虽苦，却有好房子住。至不济，还可以租住阔人们的祠堂——即连壁上都嵌着大理石的祠堂。”这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，背后却是地方土绅对流亡学子的无私接纳，是文明在危难之际彼此托付的信任。

## 影像价值： 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

这段 16 毫米黑白胶卷是 1941 年耶鲁大学学士约翰·鲁纳尔斯（John Runnels）随雅礼协会在华从事教育活动时所摄制的。他的镜头一路跟随当时华中大学师生，记录下战时校园内外的诸种景象：从核桃壳发电机到稻田操场，从藏经阁显微镜到四方街识字班。这段胶片之所以珍贵，在于其完整呈现了文化迁徙的多重维度：美国摄影师镜头中的中国古镇、流亡大学携带的现代知识体系、本土文明对异乡学人的包容。

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，目前已被华中师范大学史馆永久收藏。它不再只是“战时大学”的旁证，而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教育、西南民族交往史乃至抗战精神的一把钥匙。当今天的观众看见毛竹足球门、石灰跑道和藏经阁里的显微镜，便会明白：所谓“文明迁徙”，并非简单的地理位移，而是一群人把知识、技术与信念的种子，带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根、发芽……影片末尾，铜钟余音与洱海潮声叠在一起，仿佛提醒后来者：只要那口钟仍能响起，文明的火种就不会熄灭。

当镜头定格在文庙屋脊的吻兽与实验室玻璃器皿的交叠倒影时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烽火中的教育奇迹，更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密码。正如华中大学西迁史料陈列馆门前的铭文所示：“真正的大学不在大厦，而在大师；文明的火种不惧风雨，唯惧遗忘。”华中大教授与老舍当年在喜洲吃鱼时笑谈“破产也要痛快一下”，今日回望，那何尝不是一种以生命守护文明的决绝？这段穿越时空的影像，正是那段岁月为后世留下的生动注脚。

万忆：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谢诗思：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任副研究员，硕士生导师。